

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

冯胜利

提要 本文在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汉语语气词“古少后多”以及人类语言“无调语言语气词少、有调语言语气词多”的事实与分布的角度提出:句末语气词(SFP)和语调(intonation)可以分析为句标短语(CP)层面上同一机制产生的不同结果。具言之,句标短语层的核心补词 $C^0_{intonation}$ 的句法特征可以通过不同语调素 intonationeme 的韵律形式来实现(如询问调 question intonation, 确信调 certainty intonation, 疑惑调 uncertainty intonation, 建议调 suggestive intonation 等等)。然而,加之于语句之上的语调(F^0)的实现一旦受到来自该语言其他语音因素(如声调 F^0)的干扰和拒阻,便可能从超音段形式(语调)转化为音段形式(语气词)。换言之,语气词可以分析为语调的一种变体。据此,文章推测西周以前汉语没有句末语气词而春秋战国以后才出现的事实可能和声调的产生或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文章最后指出:人类语言用音段还是超音段手段表现语调,或许就是语调的一种参数([±超音段])。

关键词 声调 语调(超)音段-变体 句末语气词

一 上古汉语没有句末语气词

句末语气词是语气词的一种。语气词和感叹词不同:语气词表意义(如疑问、确认、建议、命令等),感叹词表情感(兴奋、痛苦等)。因此,讨论“句末语气词”必须把它们和泛指性虚词的概

* 本文曾在香港理工大学2013年9月举办的《汉语句末助词的历史与现状》研讨会上以及2013年10月Leiden大学东亚系和Zurich大学东亚系宣读,得到与会者热情的批评意见与建议,使笔者获益殊多,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笔者尤其感谢《语言学论丛》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使本文免却许多疏漏和错误。所遗缺欠,概由笔者自负。最后,笔者感谢2014年11月10日天津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藏语声调与句末语气词”研讨会上江获、曾晓渝、马秋武、阿错等先生给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香港中文大学CCK Foundation之Focus Area Project: Language and Society(项目编号7103655)和天津大学语言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念区分开来。首先，古人所谓的“助词”很多都不是句末语气词。《马氏文通》说：“‘也’‘矣’‘乎’三字，今以助一字而已”。他举的例子如：

(1) a.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b. “焕乎其有文章。”

这是传统所谓的“语助词”。它们的出现有的是韵律的需要，有的是感叹的要求，不是我们这里说的句末语气词。譬如：

(2)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往哉，生生！”《书·盘庚》^①

“呜呼”是句首感叹词。《尚书·尧典》和《皋陶谟》中的“吁、咨、于、都”等，都可以看作“感叹词”。叹词的种类有很多，如：

(3) a.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诗·邶风·柏舟》

b.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小雅·车攻》

c.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诗·邶风·旄丘》

d.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诗·小雅·白华》

最典型的就是《楚辞》中“兮”字的顿叹功能，如：

(4) 魂兮归来！《楚辞·招魂》

王孙兮归来！《招隐士》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湘君》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怀沙》

鸢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离骚》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顛领亦何伤？《离骚》

感叹词和语气词不同。张振林（1982）说：“西周金文仅有一个语气词‘哉（才）’，而感叹词有‘乌乎、繇（邈）、且（+乎+”

又)、已’四个。……西周时期有较多的句首感叹词的使用,句末语气词很少。”感叹词在任何语言里都有,以英文为例,如:

(5) Aha: “Aha! So you took the money!” 表恍然大悟之感~
原来你拿钱啦!

Wow: “Wow, that’s incredible!” 表惊奇~没治了哎!

Boo: “Boo, get off the stage!” 表不喜欢~下去啦!(bou)

Gee: “Gee, that’s super!” 表难以置信等~牛呗!

Oops: “Oops, I knocked your cup over” 表意外(对自己的错误)~哎哟,把你杯子打翻啦!

Ouch: “Ouch, I hit my thumb” 表疼痛难忍~哎呀!

Shoo: “Get out of here! Shoo!” 表驱赶(动物或小孩)~
滚出去! 哇哇!!

而句末语气词则不是任何语言都有的。不仅不为任何语言所必有,就是汉语也不是“自古而然”。郑权中早在1955年就曾指出:“上古汉语没有句末疑问助词,春秋以后始有‘乎’、‘欤’、‘哉’等句句末尾疑问助词。”王力(1980: 445)也曾指出:“在西周以前,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春秋时代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潘允中(1982: 168)则更进一步总结道:“把几个语气词连在一块使用,来表达比较复杂的语气,这在上古前期还少发现,春秋战国以后就流行了,甚至可以连接二、三个语气词来使用。如‘焉哉、已焉哉、也哉、也乎、也夫、也乎哉、也与、也矣、矣哉、矣乎、焉耳矣、诸(之乎合音)、耳或尔(而已的合音)’等等。”张振林(1982)也说:“殷代和西周、春秋时期古文字材料中的句末语助词极不发达,句末语助词的大量出现在战国时期。”下面的例子足以说明当代学者的观察是正确的。

(6) a. 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

b.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

c. 逃矣! 西土之人。《书·牧誓》

d. 勗哉夫子!《书·牧誓》

上面(6b)中的例子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里面几乎不见——说明远古汉语没有句末语气词的事实；而(6a)中的对立更说明问题：同一问句，在西周汉语(《尚书》)里不用(没有!)句末疑问词(6a)，到了汉朝司马迁的翻译里则加上了句末语气词“乎”(6b)。句末语气词有无的对立和历史的分期相互对应：西周以前没有句末语气词，语气词是春秋以后发展的结果(6c)—(6d)。

二 可能的原因与解释

如果上面的观察是正确的话，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汉语语气词的使用为什么以春秋为界？是语体的原因吗？当然可以说因为甲骨文是占卜体，故而有语体的特殊性：占卜不用疑问句，所以甲文不见疑问语气词。但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其他类型的句末语气词甲骨文也不存在的事实。是方言的原因吗？似乎也不像，因为后代并没有整个方言都没有句末语气词的情况。是殷、周语言的类型不同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那时的语言机制有何不同呢？最明显的现象是殷周的语言和英文一样，有感叹词而无句末语气词。为什么呢？

句末语气词由何而来的问题可能还是要用Labov拉波夫“以今释古 use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英文的语调往往与汉语的句末语气词相互对应。美国学者Perry Link曾告诉笔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打了几局网球后，他问球友们：“要不要再打一局？”两位的回答都是“good”。但一个同意，一个拒绝。怎么可能一个词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呢？是语调的作用。Link教授说：

(7) “The word *good* in ‘I’m good’ is pronounced in first tone plus second tone (/), they mean ‘yes’ ; when *good* is pronounced in two fourth tones (\), it means ‘no’ .” ②

就是说，同样一句“I am good”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

一个是yes, 一个是no。显然, 这是语调的作用。问题不止于此, 更有趣的是汉语(北京话)很难用一个“我好”来完成英文这两个语调的作用, 硬要对应英文的语调功能的话, 非用句末语气词才更顺口。亦即:

(8) I am Good! ↗ = 好哇! (高升调)

I am Good! ↘ = 我好啦! (低降调)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英文用语调完成的工作, 汉语用句末语气词。就是不用语气词, 也像赵元任说的: 英文 “It’s good (but)” ^▲ 汉语得说 “好是好” (which structurally mean ‘As for being good, (it) is good’) ③——英文里的语调, 汉语里变成了词汇。下面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当笔者问及如何用英文来表达北京话里表达 “警示” 语气的 “啊” (“再哭我走了啊!”) 的时候, Cornelius Kubler 教授告诉我说: 英文只能用语调 (或者外加词语) ④, 亦即:

(9) 你再哭, 我走了啊! ↗ {Don’t cry, or I am leaving.}

{Don’t cry, I am leaving ↗ }

上面的事实让我们进而看出英语和汉语有关语调和句末语气词两者之间的对应性。这里我们根据 W.R. Lee (1958) 提出的十种语调功能清单 (a List of Distinct Functions of Intonation) 以及 Wells (2006) 和 Couper-Kuhlen (1986) 归纳的五种功能, 对比中文的语气词, 简述如下:

(10)

A. 态度和感情 Attitudinal function (for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attitudes)

规则-1 高调 High Pitch → [亢奋 excitement]

“good morning” (a fall from a high pitch on the ‘mor’ suggests more excitement than a fall from a low pitch)

早上好啊!

油饼儿啊!

B. 语法功能 Grammatical function (to identify grammatical structure)

规则-II 调域运动 Pitch Movements (或升、或降 falling or rising)

i [↘] PM → [陈述 statement]^⑤ 也古代、啊当代ii [↗] PM → [疑问 question]_{Y-N} 乎古代、吗当代

C. 焦点 Focusing (to show what information in the utterance is new and what is already known)

规则-III 降调 Pitch Falling → [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

Whom did you see/What happened? I saw a man in the garden. ↘

Did you hear a man in the garden? I saw a man in the garden. ↘

你知道吗? 他考上大学了哎 [ei] ↘

D. 话语功能 Discourse function

话语功能指句与句如何接连起来的语音表现。譬如下面括号内的, 包孕句一般都比主句的语调低、速度快, 调域窄。

规则-IV 调低/快/窄 Lower/Faster/Narrower Pitch → [话语功能标记 Discourse Functor]

“The Red Planet [as it's known] is fourth from the sun.”

火星 [你知道] 就是太阳旁边的第四颗啦/嘛。

E. 心理功能 Psychological function

心理功能指把话语片段组织成单位, 以便于人的理解、记忆和使用。

规则-V 声调+停顿 Rising + pause → [清单系列 A List of XP]

You can have it in ↗ red | ↗ blue | ↗ green | ↗ yellow | or black.

i. A呀、B呀、C呀……

ii. X的、Y的、Z的……

当然, 上面五点“语调-语气词”(简化为“语调-助词”)之间的对应功能(1)还远远没有穷尽所有的语调功能;(2)其间“形式-功能”的对应性也并非总是固定的;更何況(3)某两个(或几

个)语言之间的“语调-助词”的对应情况不一定适应其他的语言。但是,语调和语气词有相当的对应性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对应性不是偶然而是有了一定内在关系的,尽管这种关系可能很复杂,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使之——就位。

如果暂时抛开细节的问题(留待将来深入研究),我们在“语调-助词”对应的事实基础之上,还观察到另一个非常重要对应律:语调与声调都是基频 F^0 的结果。下面是英文语调的基本要素。^⑥

(11)

I Rising Intonation means the pitch of the voice rises over time [↗];

II Falling Intonation means that the pitch falls with time [↘];

III Dipping or Fall-rise Intonation falls and then rises [↘↗];

IV Peaking or Rise-fall Intonation rises and then falls [↗↘].

就是说,“语调”与“声调”都是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的语音效应。譬如赵元任在谈到英文“基本调群调节”的时候说:“基本调群的调节——音高可以升降,音高域可以增减,调头重音的曲拱可能由平变升/降,下降的调核可能变成升降调,上声的调核可能变成曲折调,终因可能弱化而消失,时长也可能改变……。”(Chao 1932, 吴宗济译)当然,现实中语调的语音实现可能不只是 F^0 一种作用的结果^⑦,而声调的实现也不仅仅是 F^0 的作用^⑧。换言之,语调和声调之间的对应性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如何精确、细密地揭示它们彼此之间一致性和差异性,尚需大量的研究。尽管如此,它们彼此之间的对应和互补分布的关系也是非常明显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因如此,所以造成二者之间互补分布的原理和机制,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上面的两种对应性(语调和助词、语调和声调)可能就是解释汉语句末语气词来源的根蒂所在。首先,如果语调和句末语气词相互对应(用语调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句末语气词来承当),那么我们猜想上古汉语的句末语气词的来源就可能是语调转换的结果。然而这样的解释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语调要(会)转换成句末语气

词的问题，这个谜需要由另外一种理论假设来完成，亦即：如果语调和声调主要都靠 F^0 来实现的话（不是说语调的全部语音实现都是 F^0 ），那么声调就成了语调的“天敌”。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汉语是具有（参 Wang F. 2006）或已开始具有声调的语言，因此，我们解释句末语气词来源的“可能原因”就可迎刃而解：词语的声调迫使句子的语调转化为句末语气词。换言之，句末语气词和语调可能就是一张纸的两个面，亦即：语气词是语调的一种变体。如下所示：

(12) 语调 → 语气词/Tonal System.^⑨

上面的假设 (hypothesis) 马上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大波浪（语调）和小波浪（声调）的同现 (Chao 1932)。如果大、小波浪（语调-声调）同时共存的话，那么就无所谓取代和转换。这里，我们的解释是：大、小波浪之间的存在不是以各自独立不变的形式共存，而是更像赵元任所比喻的“橡皮带”的情况：

字调的形状也只能取平均的形状，因为特别说重的字，音高的上下极很会伸长，特别轻的时候会缩小。用图画的语言说，就是比方把平均曲线画在一个半松半紧的橡皮带上，把这带子上下一拉，这曲线的竖位标底变度就加大了，把这带子一放松，这曲线就缩扁了，竖位标底的变度就小了。（赵元任 1922）

这就形象地说明了语调（橡皮带）对声调的影响和作用。注意：如果二者是在相互调节或让步的情况下才能共存的话，那么它们的共存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存，而是协调、让步甚至征服和取代^⑩（参看曹文 2007）。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有可能是在大波浪征服、压制或融合了小波浪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其可能的类型至少有如下几种（“+”表示正值；“-”表示负值）^⑪：

(13)	Type-I	Type-II	Type-III	*Type-IV	Type-V
大波浪	$+F^0$	$++F^0$	$-F^0$	$+F^0$	$(F^0)+X$
小波浪	$-F^0$	$+F^0$	$+F^0$	$+F^0$	$+Y(+F^0)$

第一种情况 (Type-I) 是征服（或取代）；第二种是部分重合

(部分借用、部分独立);第三种是让步(语调无法实现)^⑫;第四种(互不让步)类型则不可能(见下文)^⑬;第五种情况是用其他(仍有待发掘和证明)的语音手段来实现二者各自的独立(参沈炯1998有关“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实现声调和语调的主要手段是 F^0 这一事实不变,就不能否认声调和语调在基本实现方式(F^0)上的相互排斥(亦即*Type-IV)^⑭。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压制了声调的 F^0 ,才有可能自由地实现语调的 F^0 。这个结论的反命题是:声调实现得越充分越复杂,语调受到的限制就越大。因为声调占用了语调赖以实现的 F^0 ,于是语调的功能就有可能转换成句末语气词——选用音段(而不再是超音段 F^0)的手段来实现。

上面的推想并非毫无根据。赵元任早就指出:“事实上大多数的情况是,英语的语调相当于汉语语法中语助词的作用。”(Chao 1932)司马翎(Sybesma and Li 2007)也说:“Schubiger (1965)在德语和英文两种非声调语言的比较研究中首次提出语气词(particles)和语调(intonation)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最好注意到:句末语气词并不构成声调语的所有属性。”换言之,语调和语气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为声调语言所独有;只要条件具备,结果就会发生,不管在哪种语言里。问题是“什么是条件”、“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条件无法避免”等。在这点上,Yau (1980: 51)的建议很值得重视。他说:“很多证据支持下面这一预设的普遍性(implication universal):句子语气词和语调类型之间是相互补偿的。”^⑮为什么呢?Yip (2002: Chapter 9)明确地指出:尽管声调语言也有语调,但是“声调负载着高强度的功能负荷”(2002: 272)。因此,“句末语气词就发挥了一种其它语言里纯语调的作用”(Sybesma and Li 2007)。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尤其为Yip (2002: 272)指出的“无调语气词”所证实:“如果句末语气本身没有声调,那么它们就可以看作一种‘不带声调的语调负载体(toneless carriers for intonation)’”。当然,无声语调词并非所有的超音段助词(non-segmental particle)都具

有同样的语调调值,有的语气词的语调值可能高些,有的可能低一些,但无论如何,正如 Wakefield (2010) 所概括的:“广东话的声调严重地限制了它控制(语调)音高的能力,其结果,很多类似英文用语调表达的对话体中的话语语义 (speaker-oriented discourse meanings),都用句末语气词来表达了。”^⑥

综合上述种种意见,我们可以从“调pitch”的本质属性上提出下面三项一般性的原则。

(14) 超音段语音原则

a. 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功能的单一性

基频要么用作“声调素 (toneme)”,要么用作“语调素 (intonationeme)”,而不倾向于两兼。

b. 音段和超音段的相互转化律 (Suprasegmental \leftrightarrow segmental)

(a) 音段音位 (辅音) 转变为超音段音位 (声调)

i.e., segment $>$ suprasegmental:

*-s $>$ Tone-4; *-ʔ $>$ Tone-3 (Haudricourt 1954)

(b) 超音段音位 (语调) 转变为音段音位 (元音)

i.e., suprasegmental $>$ segment:

Intonation $>$ particle

c. 语调 intonation (或语调素 Intonationeme) 是句标短语核心词 C^0 的一种句法属性 (EPP feature);

(a) $*C^0_{\text{Intonation}}$

(b) $C^0_{\text{Intonation}} > \{\text{intonationeme}_1, \text{intonationeme}_2, \dots, \text{intonationeme}_N\}$ ^⑦

i.e., 语调是句标短语 CP 核心词 C^0 的句法属性的实现 (EPP feature, 参 Rizzi 1997, Cinque 1999, Tang 2006), 句子根据不同的语力要求 (illocutionary force) 选取不同的语调素 (语气)。

原则 (14a) 可以理解为“一个形式一个功能 one form one meaning”原理的典型表现^⑧; (14b) 则是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相互

作用的可能性结果。有了(14a)和(14b),如果再给定(14c),那么我们则可以对人类语言的“语调类型”进行各种可能性的科学预测(称之为Intonationeme Typology语调语素类型),如(15)所示:

- (15) ①有声调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
 ②非声调语言没有句末语气词(除非该语言其他因素造成类似于语调和声调的冲突,才产生语气词);
 ③声调越多越复杂,句末语气词也越多越复杂;
 ④句末语气词越多越复杂,语调就越简单越贫乏(如闽南语);
 ⑤某一语言从非声调语变成声调语,将无可避免地带来“从无句末语气词变为有句末语气词”的平行发展。

当然,这五点并非上述三项原则的所有(或穷尽性)推演,将来的研究可能还会发现更多、更深刻的事实和现象。但仅就目前的问题而言,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五点预测的真实性。曹文(2007)的研究告诉我们:

通常情况下,汉语语调需要“照顾”字调,字调虽受语调的影响,但还能保持声调的区别性;比如“我姓叶,你姓王。”(赵元任,1929),比如“去重庆?去重庆。”(林茂灿,2006)等等。这种情况较为常见,研究者们也提得较多(Kratochvil;1968:35—47;吴宗济,1982;沈炯,1985;Garding,1987;胡明扬,1987:154—155;曹剑芬,2002;林茂灿,2006)。然而有时候,在语调的大浪下,字调的小浪也会被完全吞没,失去“自我”;比如“好耗家货伙!”(赵元任,1929),比如“向右看齐!”(路继伦,2006)等等。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一些感叹句、命令句中。

这里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语调怎样“照顾”(或“让步”于)字调(=声调),同时也看到语调是如何“吞没”声调的情况。这种“二一结果”(二选一的结果)说明声调与语调不能充分绝对地共现,因为它们都靠 F^0 来现身。如下文所示,(15)中所预期的正是现实所有的。

三 共时预测的证据

我们先看共时的证明。这里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有声调的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尽管我们没有查遍所有的语言，因此不能断言绝对如此，但仅就我们熟知的有声调的语言来看，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譬如：

(16)

- a. 印欧语没有声调，所以没有句末语气词^⑨；
- b. 汉语所有的方言都是声调语言，所以都有句末语气词；
- c. 广东话、闽南话的声调系统较北方方言复杂，所以广东、闽南方言的句末语气词也比一般四个声调的北方方言复杂得多；
- d. 泰国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所以有句末语气词；
- e. 越南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所以有句末语气词；
- f. 日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日文也有句末语气词^⑩；

离亚洲声调语言很远的非洲语言怎么样呢？他们大多是有声调的语言，因此也最能引起我们的关注。如果它们也会像上面预测的那样有句末语气词的话，无疑可以证明我们上述观点。赵璞嵩和李果两位同学对此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得出的事实是：非洲语有声调的语言也有句末语气词。

首先，Kisi (Kissi) 语属于非洲尼日-刚果语系，大西洋-刚果语族，班图语支。它有两种助词，第一种是否定助词 (particle) *lé*。

(17) The kisi negative particle

- a. ò tàsélándòó í sínà lé
to first-time I know NEG
'At the beginning, I did not know.'
- b. à cìsú ndú lé
they cure him NEG
'They did not cure him.'

第二种是焦点助词 (focus particle) *ní*。它可以和名词短语 (nominal phrase) 连用。

(18) a. *yá ní* ‘It is me.’
 me FOC

b. *yá cò ní* ‘It is me.’
 me be FOC

ní 也可以强调主语, 例如:

(19) a. *wàngó có wàná s/ηmgbóóndó ní*
 Wango be person stingy FOC
 ‘Wango is a stingy person/It’s Wango who’s stingy.’

b. *yá kàandíá ndú ní*
 I whip him FOC
 ‘I (myself) whipped him/I’m the one who whipped him.’

ní 还可以强调宾语, 例如:

(20) a. *máálon ó có cùú cúúwó ní*
 rice he AUX sow FOC
 ‘It is rice that he is sowing.’

b. *wánáá-pèè ãη pílá ñ cà núá ní*
 people-swagger one you see thus FOC
 ‘These are just swaggerers that you see.’

不仅如此, Banda-Linda 语是一种 Ubangian 语, 属非洲尼日-刚果语系, 大西洋-刚果语族, Adamawa-Ubangi 语支。它也有一种句末否定助词 (negative particle) *nē* (Childs 2003: 131):

(21) (Cloarec-Heiss 1995: 94—95)

a. *mē māmá kòsàrà nē*
 je RP-NÉG-faire travail pas
 ‘Je ne travaille pas.’ / ‘I am not doing the work.’

b. More common:

mē má kòsàrà mâ nē

je faire travail NÉG-faire pas

‘Je ne travaille pas.’ / ‘I am not doing the work.’

上面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调查，取例也十分有限。当然，如果要进一步证明这里的假设则需要全面的调查和统计。然而，仅据上面初步的调查我们就已经看到“有声调和有句末（或句中）语气词”的事实相互对应。换言之，它们“证实”而不是“证伪”本文的假设。我们相信，将来大面积普查将会加强本文的论证。^②

四 历史的推测

上文“有声调的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非声调语言则没有句末语气词”的对应规律能否给我一些有关上古汉语研究新的启示呢？譬如远古汉语没有语气词：“春秋以后语气词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成为汉语中一个很活跃的词类。”（向熹 1993: 112）如果说西周以前的汉语没有语气词（这是事实），再如果“有声调的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无声调语言则没有句末语气词”（上文的结论），那么我们能否推测：前上古汉语就是一个没有声调的语言呢？显然，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断言如此，但是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假设（或理设 hypothesis）。这种理设并非空穴来风。其可能性有三：

第一，据前代古音韵学家的研究，上古四声未必自古而然。请看：

(22) a. 古无去声（段玉裁）

b. 古无上声（黄季刚）

段玉裁提出“古无去声”说，在段氏的基础上黄侃又提出“古无上声”的说法。据黄侃，传统的四声在远古实为二声，亦即：平声与去声。如果我们再根据岑麒祥“入声非声”理论，那么黄氏的二声系统就成了一声系统。亦即：

(23)

a. 四个声调（平上去入）减去两个（去、上）= 两个声调

(平、入);

b. 入声不是声调(参岑麒祥 1942);

c. 上古只有一个声调: 平声。

当然, 至今尚无将黄、岑二说合而观之者。但是如果他们都是企图从不同角度来探索古声调本质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认为的本质属性综合起来看。综合的结果和以往的看法大不一样: 远古汉语没有声调。这是可能性之一。

第二个远古无声调的可能是上古声调未必四声皆备。如果我们根据王力先生的结论: 上古的“去声”原本是“入声”的一种的话(去入之分乃长入短入之别); 那么诗经时代的声调则不是四个, 而是三个: 平、上、入(两类)。后代的声调由三而四的发展也和“春秋以后语气词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事实相呼应。这是声调由少而多的可能。

第三个远古无声调的可能是声调来源的假设。根据Haudricourt(1954)等学者的研究, 超音段的声调来源于音段的韵尾辅音, 亦即:

(24) *ʔ → 上声, *-s → 去声

根据这种学说, 那么上古的上声(春秋战国或更早)可能源于喉塞音尾; 去声(晚于上声的出现)可能源于韵尾辅音的*-s(注意: 学者们对“上声”和“去声”出现的年代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显然, 这种推测也可以告诉我们声调的发展和语气词的出现、发展有同步而行的趋势。

注意: 上古汉语的声调发展和句末语气词的发展在此之前是毫不相关的两种现象, 但它们春秋以来“从少到多”则是不争的事实, 而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语调-语气实出一根”以及“声调-语调殊难两并”的原理。当然, 在没有更确凿的事实之前, 这仍然还是一种理论推测。目前我们能够相对确凿的, 只是殷商时代的汉语没有句末语气词这一点, 亦即李佐丰(2013)在“上古汉语中虚词‘也’的产生和使用”一文指出的: “虚词‘也’产生于西周后期, 普遍使用始于春秋后期”。我们知道, 《金文》无“也”字; 《尚

书》无“也”字^②；《易经》也无“也”字。这说明殷商语言和周秦语言，在句末语气词的有无上，实属类型不同两种语言。

下面的对比还进一步告诉我们，上古汉语根本没有“也”字的范畴。比较：

(25)

a.《尚书·说命》

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b.《史记·殷本纪》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同一事件，《尚书·说命》的记载没有句末语气词（只有普世性的句首叹词）；但到了《史记》则出现了“皆非也”、“是也”的“也”。什么是“也”？《马氏文通》（1898/1983）、杨树达（1984）、吕叔湘（1958）、王力（1980）、孙玄常（1984）、何乐士（2004）、李佐丰（2013）、胡敕瑞（2013）等都有过详细的论述，其分类也从大到小达八种之多；然而无论哪家的分类，均不外传信、传疑和传情的基本属性（参胡敕瑞 2013）。如果本文上面的分析可取的话，那么春秋以后“也”字所表达传信和传疑的语气，在没有句末语气词的殷商语言里也同样可以表达，不过不是用语气词而是用语调而已。事实上，不止“也”字，其他后来发展出来的句末语气词

均不见于西周以前的汉语。兹再举数例,以见一斑(取自胡敕瑞2013):

(26)

a. “也”字始见于春秋晚期的栾书缶;

b. “矣”作句末语气词始见于战国;

c. “哉(𠄎)”始见于西周《禹鼎铭》“烏虡,哀𠄎(哉)”。
张玉金(2011):“在所有句末语气词中,‘哉’出现的时间最早。”

d. “虡(=乎)”始见于西周。

如果上面现象是事实,那么殷商语言则可以不靠语气词来传情。没有语气词怎么传情?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它们可能像今天没有声调的其他语言一样,是用语调来传情。用语调传情(语态信息)并不意味着该语言没有声调,因此,远古汉语没有声调仍然还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但这种推测不是毫无根据,只是有待将来更多(直接或间接)的事实证明而已。不仅如此,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来可以深入挖掘汉语本质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思路。

五 结语

本文从声调和语调的关系上讨论了上古汉语句末语气词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和声调的产生有关系。显然,这个可能有待证实。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思路寻找证据的话,其意义会远远超出句末语气词的范围。首先,句末语气词的出现,根据本文的理论,就有可能成为观察语言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如此,伴随语气词的出现和发展的另一特点就是汉语声调的发展和丰富。声调和句末语气词是同步而行呢?还是互为因果呢?或者是第三种因素的作用呢?毫无疑问,这些都将成为汉语史研究上的重要课题。如果人类语言中的语调和语气词是基于同一机制的不同结果的话,那么上述问题的解决就更加复杂,就要从语调、声调、句末语气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入手观察和分析。换言之,语调和语气词之间可能是

一种互补的关系，语调丰富则语气词少；另一方面，语调的实现会受到声调的干扰，声调多的语言中语调就难以充分实现，于是才转而成为语气词。当然，这里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这个机制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互动过程；因此不可能一刀切^②；第二，演变发生的时代也因上古音各家的体系和所指时间段的不同而难于统一，因此有待将来的深入研究。然而，无论发展的进程如何、无论发生时间的早晚，本文所要指出的是：语调—声调—语气词三者之间彼此消长的对应关系，还是有案可稽，有史为证的。尽管声调和语调消长的准确时间难以遽定，一个相对历史发展的分段示意图可以粗示如下（“+”表示正值；“-”表示负值；“？”表不确定；“〈 〉”表变形；+、-符号的多少表强弱）。

(27) 语调、声调和语气词消长对应示意图

	殷商	西周	春秋	战国	两汉
语调	+	+/-	-/+	-/< + >	--< + >
声调	-/?	-/+	+/-	+	++
语气词	-/?	-/+	+	++	+++

如果上述分析可取的话，那么本文的意义就不止于汉语史的研究，它还给形式句法学的理论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问题。譬如，如果说 $*C^0_{\text{Intonation}}$ 的句法属性（EPP）可根据不同语言的音系系统而赋有参数变化：要么实现为超音段的语调、要么实现为音段的语气词（modality particle）的话，那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C^0_{\text{Intonation}}$ 在实现为音段形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句末的位置之上？此其一。第二，如果 $*C^0_{\text{Intonation}}$ 在实现为音段形式的时候不限于句末，那么有没有句首（包括VP首、IP首）或句中的“语调语气词”呢？事实上，赵元任在《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一文中不仅提出“英语的语调相当于汉语语法中助词的作用”的观点，而且还在英、汉语调对比中提到程度副词的作用。然而“很可惜……先生并未对它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曹文 2007）显然，这是一个有待将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第三，虽然语调和（句末）

语气词有对应关系,是不是语调的所有功能都和句末语气词一一相对应呢?^①反之亦然,是不是句末语气词的所有功能都和语调相互对应呢?如果对应,怎样对应?如果不是一一对应,哪些不对应?第四,人类语言的“语调素 intonationeme”究竟有多少种?句末语气词的“语气意义”有多少种?如何判断?如何鉴定?第五,句末语气词古今都有重合或叠加的现象。如果这些语气词从本质上说是语调的变体的话,那么语气词的合成是“覆盖”的结果还是“叠加”或“叠延”的运作?第六,汉语的演变从上古到中古沿着从综合到分析的道路进行(Huang 2014),从语调 intonation 到语气词的演变是否也是把综合型超音段形式化解为分析型的音段形式的同类运作呢?如果是的话,这个演变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最后,语调和声调的兼容、排斥与冲突,能否在实验语音学上得到证实?凡此种种,都是将来面对的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上新问题。赵元任(1935)说:“助词弄不好是根本不能体会国语的神气的”。为什么呢?如果说“助词”本来就是语调的一种变体,那么国语的神气“由何而来”、“如何而教”的问题,也会由此产生新的认识和解决方法。本文最有意义的一点还在于:如果语调和语气词果真如本文所论是一个机制的两种表现的话,那么 Liberman (1975) 早就指出的“语调不是根据句法规则指派到语句之上的现象,而是从语调词库中选择出的一种独立的词汇表征 intonation is not assigned to utterances by rule of syntax, but represents an independent lexical choice from an intonational lexicon”的假设(Ladd 1978: 141),就可在语气词这种语调变体上得到证实。

附 注

① “往哉”的“哉”是句末语气词,但它的出现是因为当时的语言已经有声调了呢,还是像德语一样是无调语中的语气词呢,仍然值得研究。显然,这是个例或例外,不是反例(例不成批,不足为反)。

② 感谢 Link 教授允准这里使用的材料。他在7月8日的回信中又强调:“The observation about ‘I’m good’ in second tone plus fourth tone meaning

‘yes’ and in two fourth tones meaning ‘no’ applies to two syllables (‘I’m’ plus ‘good’), not just the single syllable ‘good’.”这就更明显地告诉我们，这里是“语调”在发挥作用。

③ 见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 (《赵元任全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2004: 1034—1035)。此外，北京话里，一句陈述语调的话加上“吗”即是疑问；加上“吧”就表确认，也可看出句末语气词的语调作用。

④ 感谢 Kubler 教授允准使用这里的材料。

⑤ 注意：升降调的语调不同语言可以传达不同的意义。这里的格式对美国（而不是英国）的英语更合适。同理，Chickasaw 和 Kalaallisut 语，升调表示陈述而降调表示询问。这也可以看作音义结合任意性的一种表现。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本文语调和声调相互影响的立论。

⑥ 详参赵元任 (Chao 1932) 有关语调构造的 Anacrusis-Main Beat-Body 的三分结构说。这里有一个语调基频要素的简示。

⑦ 事实上，节奏、速度以及赵元任 1933 年总结的四种形式均可影响语调的实现。感谢陈轶亚给笔者的建议。

⑧ 譬如噪音的作用也参与其中。这里笔者感谢孔江平的意见。另参马秋武 (2014) 有关语调实现的多维性。

⑨ 笔者感谢阿错先生的建议：这里语调和语气词的对应性可以更概括地表述为 F^0 的使用（音节调、词汇调、音高调）与语气词（句末和句中）的对应性。

⑩ 正如赵元任 (1929) 举例“我姓叶，你姓王”时说“叶字去声要降而口气要他提高，王字阳平要提高而口气要使它下降，所以结果是一个不很降的去声叶字，不很升的阳平王字。”这里的“不很降”和“不很升”的结果正是协调、让步的作用，所谓“两种因子的代数和”。

⑪ 这里只就大小波浪之间关系的逻辑可能而言，读者可参赵元任 (1929) 四十种语调体式的详细类别和分析。

⑫ 具有丰富声调系统的闽南话无法用重音方式强调句中单位的事实 (Shyue 2010)，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某种表现。

⑬ 这里不包括赵元任“我姓王，你姓叶”这类“字调一升一降”和“语调一升一降”重合（所谓性质一样）的情况。（赵元任 1929）事实上，即使“重合”，仍然“程度不同”（赵元任 1929）。

⑭ 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 Yip (2002: 260) 所谓“语调在声调语言中比非声调语言中只稍微有一点局限而已 Intonation in tone languages is only slightly more limited than it is in non-tonal ones”就不准确了。根据 Shyue (2010: 704) 的研究，“说台湾普通话的成人在用对比重音区分焦点歧义的时候，很不敏感”。这种对重音语感的不足甚至影响到他们对台湾普通话中的重音的敏感度。李 & 冯 (2013) 则进步指出：闽南话无法在下面的语境中使用强调重音（亦即“[]”内的词），如“我已经读了 [十本] 的书了”。如果非要强调

其中的“十本”，那么就用一个强调标记“e”加在“十本”和“书”的中间，亦即：“Gua yiking khuaN tsap-pun e tseh a（我已经读[十本e]书了）。”显然，“强调”语调在闽南话里不是“只稍微有一点局限”，而是无法实现。根据本文理论，这可能是因为闽南话的声调系统比北京话复杂得多的缘故。再如非洲声调语Nupe用“长度length”标记疑问；而Kinande用边界调boundary tone标记语调群等等（详见Yip 2002: 273），都是语调和声调之间相互协调和互动中所使用的不同策略。当然，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新领域。

⑮ 原文是“(There is) evidence supporting a tentative implication universal that there is a mutual compensation between S [entence] P [articles] and intonation patterns and that the more a language relies on the use of SP in expressing sentential connotations, the less significant will be the role played by intonation patterns, and vice versa.”

⑯ 原文是“Cantonese has a lexical tone system that severely restricts its ability to manipulate pitch. As a result, many of that are expressed through intonation in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ar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同参马秋武(2014)。

⑰ 根据不同的要求实现不同的intonational-lexical 特征的参数值(intonationemes)。

⑱ 亦即“A principle by which forms and meanings tend to correspond one-to-one. Invoked especially in historical morphology”（见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P. H. Matthews, 2007: 275）。

⑲ “俄语中就有疑问语气字li，强调语气字dze。它们一般都用于作用所及的词之后，成为它的附属部分。汉语中的、了、吗、呢等的特点是都用在句末，成为句子的附属部分。”（程雨民2003: 262）。显然，俄语中的li和dze是将来值得研究的语气标记，但不完全是我们这里说的句末语气词。至于蒙古语中的语气词（祖生利兄所见告）、维吾尔语中的语气词（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听课同学所见告）以及其他未知的非声调语言中的（句末）语气语，同样是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⑳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ka, which appears with different phonetic forms, in varieties of eastern Ijo（一种葡萄牙克里奥语）”。见Giuliano Bernini; Paolo Ramat. *Native Sentence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 typological Approach*. De Gruyter. 1996. p. 68.

㉑ 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汉藏语中有的语言，如藏语，有的方言有声调，有的还没有产生声调，考察这些语言中语调和句末语气词的情况对于本文的研究应该会有帮助。”如果本文提出的声调、语调、语气词的关系可以成立的话，藏语方言中的声调产生就是验证该理论的一个重要材料。但限于时间，只能留待将来的研究。

㉒ 潘允中(1982: 169):“也字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

⑳ 伴随现象或引发后果究竟什么时候出现、怎么出现都是崭新的问题而有待将来的深入研究。

㉑ 譬如赵元任所举的七种 (M!, O!, Oo!, Ei!, A!, Ar? Aa?) “单呼词” (赵元任 1929), 就很难在英文中找到绝对对应的语调或形式。

参考文献

- 曹文 (2007)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研究的贡献,《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北京。
- 岑麒祥 (1942) 入声非声说,《图书月刊》第2卷第7期。
- 程雨民 (2003) 《汉语字基语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
- 邓思颖 (2002) 粤语句末助词的不对称分布,《中国语文研究》第2期,香港。
- (2006) 粤语疑问句末 ‘sin1’ 字的句法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北京。
- 方晓燕 (2003)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词》,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 郭锡良 (1989) 先秦语气词新探(二),《古汉语研究》第1期,长沙。
- 何乐士 (2004) 《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 胡敕瑞 (2013) 《老子》诸本的句末语气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上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 李艳惠、冯胜利 (2013) 论狭域焦点的韵律偏差性,“汉语韵律语法讨论会”论文讲演,香港中文大学。
- 李佐丰 (2013) 在上古汉语中虚词“也”的产生和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上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 铃木直治 (1994) 《中国古代语法の研究》,日本汲古书店。
- 刘来成 (1997)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北京。
- 陆俭明 (200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罗端 (2013) 对古汉语否定句里代词宾语位置的进一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上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 吕叔湘 (1958) 《文言虚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马建忠 (1898/1983) 《马氏文通》(重印本),商务印书馆,北京。
- 马秋武 (2014) 汉语语调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当代外语研究》第1期,上海。
- 麦耘 (1993) 广州话“sin”再分析,《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
- 梅祖麟 (1977) 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中国语言学论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 潘允中 (1982) 《汉语语法史纲要》,中州书画社,郑州。
- 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著,潘悟云、徐文堪译) (1999) 《上古汉语的

- 辅音系统》，中华书局，北京。
- 沈 炯（1998）汉语语调分类和标记方法试说，《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北京。
- 孙玄常（1984）《马氏文通札记》，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
- 王 力（1980）《汉语史稿》，中华书局，北京。
- 向 熹（1993）《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 杨树达（1984）《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北京。
- 杨永龙（2000）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古汉语研究》第4期，长沙。
- 张振林（1982）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北京。
- 赵元任（1922）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科学》第7卷第9期。另见赵元任（2002：27—36）。
- （1924）语音的物理成素，《科学》第9卷第5期。另见赵元任（2002：103—112）。
- （1926）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另见赵元任（2002：133—176）。
- （1929）北平语调的研究，《最后五分钟》附录，中华书局，北京。另见赵元任（2002：253—272）。
- （1935）国语语调（讲演），《国语周刊》第214期。另见赵元任（2002：426—434）。
- （1959/1980）《语言问题》（中国台湾大学）；1980年新版，商务印书馆，北京。
- （2002）《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吴宗济、赵新那编，商务印书馆，北京。
- 郑权中（1955）汉语句末疑问（语气）词和被动语态（演变）的研究，《复旦学报》第2期，上海。
- 郑张尚芳（2012）《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中华书局，北京。
- Alleton, V. (1981) Final Particles and Expressions of Modality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1, 91-114.
- Bohr, Wolfgang (2011)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Dating of the *Lunyu*: Mythological Notes and Future Prosp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Lunyu: A Western Han Text?" hel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November, 2011.
- Bolinger, D. (1951) Intonation Levels versus Configurations. *Word* 7:199-200.
- Brazil, Coultheart (1975) *Discourse Intona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 Brazil, David, Malcolm Coultheart and Catherine Johns (1980) *Discourse*

Inton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gman.

- Chan, M. (2002) Chinese: Gender-related Use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Gender Across Languages: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Men*, vol.2:57-72, Hellinger, M., Bussman, H. (Eds.),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Chao, Y.-R. (193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 《史语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选》104—156页。又, 吴宗济节译见赵元任(2002: 718—733)。
- (1933)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中国字调跟语调), 《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3分。又, 陈保亚中译“汉语的字调跟语调”(1992), 载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102—116页,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胡明扬中译“中国字调跟语调”(1996)载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赵元任卷》848—866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 陈译另见赵元任(2002: 734—749页)。
- (1947) *A Cantonese Pri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Cheng, L.L.S.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Cheung, S.H. (张洪年,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Cheung, K. (1986) *The Phonology of Present-day Canto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Childs G. Tucker.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hiladelphia.
- Chu, C.C. (2002) Relevance Theory, Discourse Markers and the Mandarin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a/ya.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1:1-42.
- Cinque, G.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 OUP USA, New York.
- Cloarec-Heiss, France. (1995). Le banda-linda. In *Le système verbal dans les langues oubangiennes*, ed. Raymond Boyd, 81-109. München and Newcastle: Lincom Europa.
- Cooper-Kuhlen, Elizabeth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Prosody*, *Forschung & Studium Anglistik* 1, Tübingen: Max Niemeyer & London: Edward Arnold.
- Cruttenden, A. (1997) *Inton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 (1969) *Prosodic Systems and Intonation in English*,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 (1975) Prosodic Features and Linguistic Theory, in *The English Tone of Voice*, Edward Arnold.
- Crystal, D. and R. Quirk (1964) *Systems of Prosodic and Paralinguistic Features in English*, Mouton.
- Fabb, N. (1992) Reduplication and Object Movement in Ewe and Fo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3/1: 1-39.
- Feng, SL. (2014)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In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iley-Blackwell, ed. by C.-T. James Huang,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537-575.
- Fung, R.S.-Y.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 Halliday, M.A.K. (1967) *Intonation and Grammar in British English*, Mouton.
- Halliday, M.A.K. and Greaves, W.S. (2008) *Intonation in the Grammar of English*, London, Equinox.
- Haudricourt, A. G.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of Asiaitiae* 242. 冯燕中译文“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1集。
- Hirst, D.J. & Di Cristo, A. (ed.) (1998) *Inton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wenty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 (2009) Lexical Decomposition, Silent Categories, and the Localizer Phrase. *Yuyanxue Luncong* 39:86-122.
- (2014)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Dylan Tsai (eds.) Oxford i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rsner, R., Van Heuven, V. (1996) Boundary Tones and the Semantics of the Dutch Final Particles *he*, *hoor*, *zeg* and *joh*,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33-146, Cremers, C. & Den Dikken, M. (Eds.),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Kirsner, R., Van Heuven, V., Van Bezooijen, R. (1994) Interaction of Particle and Proso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ctual Dutch Sentence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07-118, Bok-Bennema, R., Cremers, C. (Eds.),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Kwok, H.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 Ladd, R. (1978) *The Structure of Intonational Mean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aw, S. (1990)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 Partic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 Law, Y.K.A. (2004)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Lee, W.R. (1958) *English Intonation: A New Approach*. North-Holland.
- Lian, A-P. (1980) *Intonation Patterns of French*, River Seine Publications, Melbourne.
- Lieberman Mark (1975) *The Intonational System of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MIT.
- Matthews, S. & Yip, V.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Routledge, London.
- McCawley, J. (1968) *The Phonological Component of a Grammar of Japanese*. The Hague: Mouton.
- (1978) What is a Tone Language? In V. Fromkin (ed.),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113-13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Odden, D. (1995) Tone: African Languages. In: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444-475., edited by J. Goldsmith,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Matthews, P. H. (2007)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errehumbert, Janet (1980) *The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of English Intonation*. Ph.D. Dissertation. MIT. Published by Indiana Linguistics Club 1987.
- Pierrehumbert, J., Hirschberg, J. (1990) The Meaning of Intonational Contou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In: Cohen, P., Morgan, J., Pollack, M. (eds.), *Intentions in Communication*: 271-312,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Pike, K.L. (1945) *The Intona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 Roach, Peter (2009)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ck, Katrina. (2000) Comparison of Intonation Patterns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for a Particular Speak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Working Papers in the Language Sciences, *Spring 2000 No.1*: 29.
- Schubiger, M., (1965) English Intonation and German Modal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Phonetica* 12: 65-84.
- Shyu, Shu-ing (2010) Focus Interpretation of *zhi* 'only' Associated Arguments in Mandarin Triadic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s* 48/3: 671-716.
- Simpson, Andrew (2014)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Handbook of Chinese*

- Linguistics*, C.-T. James Huang, Andrew Simpson and Audrey Li (eds.), Wiley-Blackwell.
- Sybesma, Rint and Boya Li (2007) The Dissection and Structural Mapping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Lingua* 117 (2007) 1739-1783.
- Wakefield John (2010) *The English Equivalent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Ph.D. Dissertatio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Wang Feng (汪锋, 2006) Rethinking the *-s Hypothesis for Chinese *qusheng* Ton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1:1-24.
- Wells, J.C. (2006) *English Intonation: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Xu, Dan (徐丹,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u, S.C. (1980) Sentential Connotations in Cantonese. *Fangyan* 1:35-51.
- Yip, Moria (2002) *T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Yip, Virginia and Steven Matthews (2000) *Basic Cantonese. A Grammar and Work Book*. Routledge, London.
- Yiu, C. (2001) *Cantonese Final Particles 'lei', 'zyu' and 'laa': An Aspectual Study*, M. 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Zwart, C.J.W. (1993) *Dutch Syntax: A Minimalist Approach*. Doctoral Dissertation. Groningen.

Tone, Intonation and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Shengli Feng

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that mor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SFP) exist in tonal languages while less or no SFPs are found in non-tonal languages, and also the fact that no SFPs were attested in pre-Archaic Chinese which is arguably a non-tonal language until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770-476 BC) where a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tones and SFPs are observed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then argued that intonation and SFI are fundamentall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namely, both are generated by the same head $C^0_{\text{INTONATION}}$ under the CP-syntax parameterized as

[± suprasegmental] and conditioned on [± tone system] in human languages.

Keywords: tone, intonation, (supra-) segmental alternation,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SFP)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sfeng@cuhk.edu.hk)